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英】伟烈亚力 著 赵康英 译 顾钧 审校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

（附传教士略传及著述目录）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英】伟烈亚力 著 赵康英 译 顾钧 审校

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名录

（附传教士略传及著述目录）

MEMORIALS
OF PRE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 / (英) 伟烈亚力著 ;
赵康英译 ; 顾钧审校.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01-07373-6

I. ①基… II. ①伟… ②赵… ③顾… III. ①新教-
传教士-人名录-世界 IV. ①B979.9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034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4.3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00 千字

定价:50.00 元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中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

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家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原“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的作者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传教士。受伦敦传道会派遣,他于1847年来到中国,协助麦都思管理上海墨海书馆,负责《圣经》和福音书籍的印刷工作。伟烈亚力精通中、法、俄等国语言文字,博学多才,是一位态度谦和、治学严谨、工作勤勉的学者。伟烈亚力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将近30年,其间致力于传教、传播西学、研究汉学,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成绩卓著。

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伟烈亚力与中国学者李善兰、王韬等人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对中国数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等数学著作,以及介绍天文学的《西国天学源流》、介绍力学的《重学浅说》等科学书籍,将西方最新的数学、物理和天文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除对西学东渐贡献重大之外,伟烈亚力在东学西传方面同样功不可没。他致力于研究汉学,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文和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宗教、历史以及文献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他编著的《匈奴中国交涉史》、《满蒙语文典》、《中国文献纪略》、《中国数学札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等书籍,以及他对西安府景教碑的研究在当时西方汉学界都颇有影响,无人能够企及。

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该杂志是上海第一份综合性中文期刊,成为晚清中国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刊物之一。

1862年,伟烈亚力回国,脱离伦敦传道会。1863年,他以大英圣经公会代理人的身份再度来到中国传教。1877年,伟烈亚力因患眼疾,返回伦敦定居,于1887年逝世。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于1867年在上海出版。该书从马士曼开始,直到1867年1月到达上海的裴牧师为止,一共收录基督教新教早期分别由多个传教团体派遣向华人或到中国传教的338名传教士,并对每位传教士以及其中一些传教士的家属和最早受洗的几位中国基督徒作了简短的生平介绍。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一书最大的亮点是对传教士在此期间出版的中、外文书籍做了全面的总结整理,并列出了书目清单。除用各种中国方言翻译的《圣经》、祈祷文、布道文等传教文章和书籍之外,传教士出版的书籍中有许多介绍西学的书籍,涉及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历史、语言等诸多文化和科学知识领域,对研究西学东渐的历史极有参考价值。有些传教士将自己在华境内及周边地区的巡回传道和游历的经历写成游记,不仅记载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同时还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一些书籍则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商业和贸易的情况,是研究东学西传和清朝对外贸易历史的珍贵史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教士出版的书籍中,还有一部分记载了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例如:马礼逊所著的《1816年英国政府派往中国朝廷公使团要事实录》和《中国和广州港、蜂鸟号帆船事件以及广州大火简介》等,为研究我国清朝时期对外关系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需要使用汉语对《圣经》及福音书进行讲解,因此他们必须学习掌握汉语知识。因此,在传教士出版

的书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包括常见方言在内的中国各种语言的教程和字典。例如马礼逊的《汉语语法》和《华英词典》，麦都思的《汉语闽南方言字典》，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以及高德的《汉英潮州方言词典》等。这些书籍一般采用罗马字母拼音标注汉语或中国方言的发音，由此产生多种不同拼音体系。这些字典对研究汉语的拼音历史以及汉语西传的历史极有价值。

此外，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期刊杂志不仅对东学西渐贡献重大，同时也是西方汉学研究的真实记录。例如：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郭实猎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及伟烈亚力创办的《六合丛谈》等期刊杂志，都是中外学者研究清代历史极具参考价值的史料文献。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不仅是一部研究清代历史、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以及近代西学东传的重要文献，还是一部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和海外汉学发展史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的翻译出版一定会对我国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帮助很大。

赵康英

2011年5月于沈阳大学

前言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从一开始就与用汉语翻译《圣经》的计划紧密相连,而《圣经》的翻译又是一项需要先驱们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工作。他们的后继者亦是如此,把这项翻译工作当作第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由于一开始就在这方面不断地努力,现在已经结出累累硕果,令我们每个参与此事的同仁都甚感满意。马礼逊(Morrison)、马士曼(Marshman)和米怜(Milne)等人最初的辛苦工作,使得两部最早的《圣经》全译本^①得以圆满译成,并且大约在1822年同时出版发行。

此后不久即是对《圣经》的修订和补充,这也是最初的翻译者在一开始,甚至在把译著付印之前就已经考虑过的事情。在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郭实猎博士(Dr. Gutzlaff)和裨治文博士(Dr. Bridgman)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与马礼逊博士之子的沟通,又有两个不同翻译版本问世(麦都思译本和郭实猎译本)。

随后,“代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Delegates)于1850年出版发行了《新约》的新译本和由伦敦传道会成员翻译的《旧约》。大

^①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在印度的塞兰布尔地区传教时,于1811年将《新约》译成中文,1822年又将《旧约》译成中文,并于同年出版发行。但因该译本在印度译成,流传不广,对以后中国境内的《圣经》汉译本影响不大——译者注。

约两三年之后,又有出自裨治文博士和克隆存先生(Mr. Culbertson)之手的《圣经》全译本修订版与世人见面。

与此同时,美国浸礼会的代表高德牧师(Rev. J. Goddard)着手翻译另一个版本的《新约》,他的译本主要为该教派的成员所使用。

由麦都思博士主译的官话版《新约》全译本流传甚广,而由侨居北京的传教士们所做的第二个译本也行将完成。

完整的《新约》已被译成宁波方言和福州方言,《旧约》和《新约》中的部分章节也已有了上海、广东、客家、厦门和金华等方言的版本。

释经方面也有一些珍贵的文献,但是仍然迫切需要一部完整的注释。

印刷所在传播教会和世俗知识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从开始到最后一共出版了多少种著作。由于缺少有关这一方面信息的沟通渠道,也造成了一定的不便:有些人由于不知道有哪些书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有时会在无意中花费时间和精力重复了前人的工作。许多人表示:为了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应该让人们了解必要的信息,这样就会节省许多宝贵的时间,并让现在的教会事工能够享用到以前出版的书。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在编辑成书的过程中,编者得到该领域大部分传教士的热心协助。现有的书目清单包含了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所有已经出版的著作,虽然一定会有遗漏,但相信不会很多。这样做会对传道会和宗教印刷品协会有好处,因为有一份过去工作的总结摆在面前,可以让他们对未来的出版有一个选择。

通过查阅分类索引,可以大致了解各个分支领域中已经出版的作品、使用的方言以及提供更多信息的页码。大多数的书籍或宗教小册子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而许多出版物都是很常见的,所有者根本无法找出谁是原始作者。查阅汉语字母顺序的索引,很容易

找到著作的题目,并且根据提供的页码,可以找到对该著作所做的必要和特殊的陈述,有时还会对著作的历史有一点交待。许多早期传教士在他们的作品中不使用原有的书名,而采用其他的修饰语,凡是这种情况,都已经予以指出,并标明它们的日期。

为了尊重先辈们所做的工作,在所收集的一些特殊的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已经加上在最初四十年期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的名字。

应该注意到,绝大部分的著作旨在行文通俗易懂,这样就会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有时甚至在邻近的一些国家中使用。但是由于方言不同,风格也多少有些不同,许多传教士在书面文字中采用了特定地方的俚语。

至于官话,它有语言惯例和固定的文字书写方法,其他的方言则没有这个优点,必须花费大量的心思考用最恰当的方法将它们简化并用文字写出来。汉字有自己的自然含义,可以直接采用。但是在一些特殊方言中,大量的词却没有相对应的书面文字。另外,还有一些词,口语发音远远有别于读音。要想表达出所有这些是不可行的,必须把带有大量手势的平常用语转变成文字,有时反而增加了麻烦。自然,这种表达方法因方言的不同而使用的力度也不尽相同。

此处所谈及的麻烦,即指用以前欧洲国家普遍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最适合用来将当地的发音转变成罗马字母的组合,而且很成功。许多著作在宁波、上海、厦门、客家和金华方言出版。必须承认,在用罗马字母表示汉语发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武断之处,而且为了达到要求,采用了各种技巧。在协调各种观点时困难重重,有时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来达到目的,这也让人们对西方字母的不完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其中主要的有上海浸礼会传教士们普遍使用的、由高第丕先生(Mr. Crawford)发明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每一个字符清楚

地代表一个读音,不同音标组合中相同的音固定一致,同时,合成的笔画也特别适合中国毛笔书写的特点。

还有其他语音体系也被提出,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过有人使用。

即便每一种方法都有益,我们的本意也不是在此讨论相关文字的长处和俚语的写法。那些热心工作、致力于上帝的荣耀和渴望同胞们获得拯救的人们,将他们的的心思都放在同一个主题上,我们心存敬意地期待着这一动机下所产生的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接受少数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拒绝苛刻的评价标准,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宽恕任何超出我们所特有观念的事情了。天赋有差异,才能各有不同,因此,为了我们所期待的唯一伟大目标,出于真实信念而提出的许多工作计划,皆可共同努力而为之。我们将会对每一位把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人类伟大事业的兄弟说:上帝会帮助你的!

除了传播上帝的真谛之外,基督教的发展总是带来普遍的影响。在文明的进程中,一种公认具有潜力的技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实际的发展。在 18 世纪早期,巴黎刻出一套多达十几万字之多的汉语木板活字,但是对于普通印刷品来说这么巨大的规模用处甚少;而且在那时不可能将汉字缩小到铅字字体要求的范围之内。铅字样本不断地由英格兰私人公司制作出来。自从沃茨先生(Mr. Watts)制成一种非常整齐和准确的字模以来,已将近半个世纪。但是这种字模的成本极高,将活版用于普通汉字印刷希望不大。伦敦传道会的戴尔先生(Mr. Dyer)孜孜不倦地努力和奉献,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通过将欧洲的技术和本地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他成功地推出一种非常精美的字模,而且成本适当。最近,电气科学的应用使得姜别利先生(Mr. Gamble)的技术更为完善。汉字活版印刷自然也相同于欧洲任何一种语言的印刷。

本书中所提到的 338 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时间总和为 2511 年,平均每人的传教时间为 7 年半。或者,如果我们扣除现在正在

传教的 124 个传教士,还剩 214 位已经完成传教任务的传教士,总时间大约 1559 年,平均每个传教士的时间比上面提到的年数减少了不到四分之一年。这个数字包括传教士通常因为健康的原因返回故土以及到其他地方去的时间。

下面是不同的服务年限对照表:

服务年限	传教士人数	服务年限	传教士人数
35~40	2	30~35	2
25~30	13	20~25	4
15~20	22	10~15	39
5~10	70	0~5	186

61 位在服务期间殉职的传教士当中,有 6 位在暴力中遇难:芒森先生(Mr. Munson)在苏门答腊被巴泰克食人族杀害,娄理华先生(Mr. Walter Lowrie)在从上海到宁波的途中被海盗杀害,法士先生(Mr. Fast)在闽江被海盗杀害,花先生(Mr. Holmes)和 H. M. 帕克先生(Mr. H. M. Parker)被山东的捻军起义者杀害,端木荣直先生(Mr. Thomas)则被朝鲜人杀害。基律先生(Mr. Gaillard)在广东的一次台风中因房子倒塌而遇难;巴格尔博士(Dr. W. Parker)在宁波经过一座桥时从马背上落入运河中丧生,贝纳姆先生(Mr. Benham)在暹罗(即泰国)的湄南河溺水而亡,波罗满先生(Mr. Pohlman)死于中国海岸的一次船只失事之中,斯波尔丁先生(Mr. Spalding)据说在一次去香港的途中遭遇台风而亡,詹姆斯先生(Mr. James)则在一次从广东到香港的帆船倾覆中丧生,S. 沃尔夫先生 (Mr. S. Wolfe)在一次巡游时于棉兰老岛附近死在船上,高大卫先生(Mr. Collie)死在从马六甲到新加坡途中,法国人罗啻先生(Mr. Doty)、历浹先生(Mr. Richards)和拜尔斯先生(Mr. Byers)死于去美国的途中,而法默先生(Mr. Farmer)和祝恩赐先生(Mr. Jones)则死于去英格兰的

途中。

下面以一个表格作为结束语,其中标明曾在中国设立传道机构的传道团体名单和他们开始在中国传道的日期。

序号	汉译名称	英语名称	开始日期
1	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07 年
2	荷兰传道会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1827 年
3	美部会传道会 (也叫公理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1830 年
4	美国浸礼会传道会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1834 年
5	美国圣公会传道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5 年
6	英国圣公会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ary Society	1837 年
7	美国长老会传道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8 年
8	(英格兰) 浸礼教总会	General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England)	1845 年
9	巴色会 (巴塞尔福音会)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at Basel	1847 年
10	礼贤会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年
11	美国南部浸信会 传道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7 年
12	美国安息浸信会	Seventh 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U.S.)	1847 年
13	美以美会	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ary Society	1847 年
14	英国长老会 传道会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1847 年

15	美国南部监理会 传道会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Southern States of American	1848 年
16	瑞典隆德传道会	Missionary Society at Lund, in Sweden	1849 年
17	卡塞尔传道会	Cassel Missionary Society	1850 年
18	巴陵会	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	1851 年
19	(英格兰)循道会 (亦称卫斯理公会)	Wesleyan Missionary Society(England)	1852 年
20	(英格兰) 中国福音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England)	1853 年
21	荷兰中国福音会	Netherlands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1855 年
22	美国荷兰归正会 传道会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8 年
23	波美拉尼亚 中国福音联合会	Mission Un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in Pomerania	1858 年
24	英国浸礼会	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60 年
25	英国圣道堂	New Connectio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in England	1860 年
26	巴黎 法国基督教新教会	French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 in Paris	1860 年
27	美国联合长老会	American 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	1860 年
28	中国内地福音会	Chinese Inland Evangelization Society	1862 年
29	外部宣教会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	1862 年
30	英格兰偕我公会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England	1864 年
31	苏格兰联合长老会	Mission Board of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	1865 年

除了表中所提到的,还有很多偶尔来华且与任何团体都没有关系的传教士。